

功能解构、身份建构与行动重构： 五四知识分子通向革命之路

梁君思

摘要：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各类型社会矛盾的产生，并催生了知识分子的功能解构、身份建构与行动重构。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其中，五四知识分子的功能解构接续了传统功名士子精神气质分化、政治理想分化、行动方略分化的历史逻辑；其身份建构生成于知识分子离家出走、合群方式渐进演进、遭遇巨变思想跃迁的现实逻辑；其行动重构锻造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行动的实践逻辑。当然，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及革命之路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换。总之，将五四知识分子通向革命之路的考察置于长时段脉络之上，有利于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知识分子接续的社会功能、面对的现实基点以及未来的可能空间。

关键词：五四知识分子；功能解构；身份建构；行动重构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6—0143—09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或时代标签，“五四”似乎已是完成时态。但无论是亲历者还是研究者，有关五四的议题总是众说纷纭。一般而言，狭义的“五四”特指1919年的学生运动，而广义运动的“主要事件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①。当然，关于五四运动的上下时限并未形成共识性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五四未竟的事业：“‘五四’运动时代不是孤立的，由辛亥革命而‘五四’运动，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而抗日战争，是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代之各个事变。”“‘五四’运动的缺点，乃参加运动的主力仅仅是些青年知识分子，而没有生产大众，并不能够说这一运动的时代性已经过去。”^②由于五四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因此把五四知识分子通向革命之路的考察，放在1915年至1927年间连续性的历史脉络中，更容易把握其社会功能、历史使命及时代贡献。

当前，学界有关五四知识分子的研究极为丰富。有的关注其合群特质，并认为随着“绅”地位的没落，五四知识分子出现了表达社会身份的新方式，出现了一些“易于识别但外表相当松散的多中心的亚文化圈世界”^③。有的学者关注其思想特质，并认为“五四思想的一大特征就在于这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想，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迈向第二个百年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新贡献研究”（项目号：21&ZD020）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梁君思，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①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张静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② 陈独秀：《“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38年5月15日），《陈独秀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88页。

③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同时并存而互相纠缠、互相激荡，造成当时思想风云中最诡谲歧异的一面”^①。还有的学者关注其群体分化，并认为五四知识分子的三波分化“首先是寻求点滴改良的温和知识分子与追求整体解决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分化，其次是相信兼容各种‘主义’的知识分子与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分化，最后是‘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元的列宁主义’者的分化”^②。笔者认为，五四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个体存在方式及合群方式转换的关键阶段。虽然五四知识分子呈现出高度卷入政治生活的特征，但政治人的第一身份并不构成其身份谱系的全部。在力量上并不占据优势的政治人，不得不凭借其知识人的身份支援推进其政治理想。多重身份的嵌套与脱嵌，使得五四知识分子在流动性、平铺化社会中面临着多种可能。

一、功能解构中的分化及其流变

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大一统政治体系中，功名士子既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与精神气质。作为历史传统连续演进的产物，科举制度构成了中央集权与基层治理重要的流动机制和平衡机制。矗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其对应官僚体系的末端是县令，县之下还设置都、图、乡、里、正等名目不一的乡镇组织。但真正起到社会组织作用且构成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基石的是家庭，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具有极大的向心力。功名士子在官、在野及其肩负的社会功能，保持着帝制中央集权与基层家族组织之间的脆弱平衡。

（一）精神气质的分化：知识传播、政治官僚、学术传承

作为异族征服者的权宜之计，清朝朝廷实行了强有力的控制措施，但控制效率的提高却窒息了官僚体系的弹性空间和政治能动性。满族权贵和汉人官僚关系的紧张，打破了功名士子试图维系的家国利益的脆弱平衡，这种失衡在19世纪的内忧外患之下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名存实亡和地方主义的日趋坐大。当功名士子不再倾心于缓解家国体制的弱平衡，不再听命于强中央，不再约束于社会关系及其伦理规范时，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及其特性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迁。晚清以降，功名士子明显地地方化了。兼具知识人、政治人身份特质的功名士子，日益演化为侧重于政治人特质的官僚士大夫和侧重于知识人特质的文人士大夫。从洋务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士大夫，到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文人士大夫，再到新政时期培养出来的新式士大夫，晚清士人阶层经历了极为复杂的代际更替。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阻断了政治人与知识人身份嵌套的制度纽带，不同身份特质的有所侧重外化为不同类型群体的众声喧哗。新式士大夫更是脱离了传统帝制单一的价值轨道，并试图在结盟中探寻治学之道和变革之路。从知识—政治—学术之间的互动来看，传统帝国体系中政、教、学合而为一的高度耦合开始“道分为三”，传统士大夫阶层在角色认知的裂变中开始沿着知识、政治、学术的不同脉络分流演化。知识传播、政治官僚、学术传承三重角色的各自演化与相互剥离，使得传统士大夫阶层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世代转换极为复杂。

（二）政治理想的分化：皇权政治、政党政治、军阀政治

20世纪第一个十年积蓄的变动不居在1911年达到高潮，改朝换制的辛亥鼎革并未达成新的社会整合，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分裂。政治团体的大量出现，催生了革命后的政治生态。这些政治团体，名义上都是要通过代议制竞争政权。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同盟会。同盟会改组并与其他四个政党合并为国民党之后，在1912—1913年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但是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议会与政党运动便付诸东流。孙中山认为挽回辛亥革命的失败“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号召发动“二次革命”。仓促上阵的讨袁军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战略协同与群众参加，不到两个月便失败了。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准备发动新的革命。袁世凯则是在独裁政体和君主制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

^①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② 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914年1月，袁世凯正式下令解散国会。

为恢复君主国体，袁世凯操纵参议院制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1915年12月11日，参议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上书向袁“劝进”。12日，袁世凯发布命令，承受帝位。31日，袁世凯下令将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1月1日即皇帝位。称帝的倒行逆施遭遇到强势反抗。云南、贵州等地发动护国战争，纷纷讨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惧而死后，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迅速暴露出来，在帝国主义各国的分别收买和互相争夺下，分裂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派之间的争权夺利，这标志着军阀时代的到来。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形态，军阀政治的实质是武治，更具破坏性。皇权政治解体后，自由主义政党政治和独裁政体的相继失败及其后续军阀政治的滥觞，构成了民初政治试验的反面教材。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迎来了政治、思想、社会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如果说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主要清除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的话，那么第二个十年主要清理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思想障碍。辛亥革命迎来了改朝换代，但政党政治的畸形、皇权政治的复辟和军阀政治的滥觞表明，新的共和政体并未确立合法性根基。严复认为，共和革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康有为认为，君主政体才能收拢分散化的世道人心；梁启超认为，袁世凯的共和独裁才能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孙中山认为，应当在反思革命屡遭失败中找寻新的政治基础。

（三）行动方略的分化：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组织革命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堕落、残破、腐败、混乱和黑暗表明，单向的政治革命虽能终结旧制度的苟延残喘，但并不能荡清传统势力的污泥浊水。孙中山沉痛地感慨：“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①知识界普遍认为，旧势力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并不是新制度不好，而在于旧文化的思想根源，改变民族精神的新文化才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因此，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批判指向已然不再是旧的社会制度，而是聚焦于对旧文化的全面抨击。1917年留美归国途中的胡适，声称“二十年不谈论政治”，亦是表达了新文化运动的普遍情绪。五四之前的知识界普遍认为，改变意识才能拯救革命失败，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

作为一场运动，“五四”不是开端，也不是终点。虽然辛亥革命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一气呵成，但仍不是一场总体性的社会革命。梁漱溟认为：“辛亥革命，自一方面说，固不同于过去之变化改制而止，但至多亦只算得中国礼俗丕变之开端。必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向旧礼教进攻，而后探及根本，中国乃真革命了。”^②相较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时人预测：“往岁之革命为形式，今岁之革命在精神。”^③五四运动的发生，改变了知识分子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国问题的路径。五四运动中学生辈知识分子的政治行动，推动着老师辈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政治。换言之，回避已有政治基础谈论中国问题的技术路线悄然转换。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讨论，开始走向前台。正如陈独秀所言：“‘五四’运动因外交而牵到内政，而牵到一切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运动，一时颇现出一点革命的空气，‘五四’的真价值在此。”^④

作为一种与现有社会政治文化秩序相决裂的集体行动，革命一词构成了20世纪最具号召的表达。相较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政治革命主题的积淀、第二个十年思想革命主题的积淀，20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主题是组织革命的积淀，即：建立推动社会革命的组织基础。在五四之前，知识分子尚未注意到将群众组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5页。

③ 高一涵：《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1917年1月），郭双林、高波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高一涵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④ 陈独秀：《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1923年5月2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6页。

织起来所蕴含的政治能量。即便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仍视“启蒙群众”为己任,而未将“组织动员”作为方向。五四时期流行于知识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为五四知识分子通向革命之路打开了视野。与胡适等人回避政治势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路径不同,李大钊等人认为,建立先锋型政党将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才是从总体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①

二、身份建构中的合群及其跃迁

在功名士子占据较高声望的传统中国,承担社会阶层流动功能的科举制度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光耀门庭、飞黄腾达的仕途之路上。虽然朝廷授予功名的士子有可能暂未被纳入正式的官僚体系,但滞留于宗族关系之中充当私塾先生和代言地方利益的士子仍可以凭借其社会地位维系家国关系的平衡。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摧毁了功名士子地方利益代言人和公众意志监护人的政治基础。功名士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遭遇的权势迁移及功能解构,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分裂。原本集社会声望、思想权势等于一身的功名士子,试图在身份建构中谋求新的社会位置。

(一) 知识分子的离家出走:桎梏、突破及行动

家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也是个体走向社会的桥梁和中介。家、国、天下之间位置的确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秦汉之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②,“天子建国,诸侯立家”^③等制度设计,使得“有国有家者”^④的隶属关系相对明晰,天下、国、家之间各司其职。隋唐科举制推动了平民与统治阶层的对流。随着宋以来宗族平民化、皇权集权化积淀,家国同构在移孝作忠伦理下实现了有机衔接。在“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⑤等行为准则之下,形成了“身”“家”“国”“天下”的伦理秩序。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社会现实,家庭制度是大一统帝国政治体系维系基层治理的重要支撑。明朝中期之后,以祠堂、族田、族规、族权为基本要素的宗族组织体系逐步形成。族长是家长的延伸,族权联结家和国。宗族开始在社会基层治理中产生影响,“皇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晚清以降,外国侵略下中央集权式微、地方主义兴起造成的山河破碎,使得一部分思想激进的读书人视家为“私”的象征,认为“小则为乡族之争斗,大则为国际之干戈”^⑥皆因族姓。“天下一家”的政治想象在近代激变为破家毁家的主观能动。例如,康有为期待打破家界,化“家界”为“天民”,“人皆天所生也,故人人皆直隶于天”^⑦。梁启超亦有“以大同为条理”“杀身破家”^⑧等政治表达。

20世纪初,家似乎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家的革命成为突破枷锁的关键。师复声称:“自有家族,则以家为社会之单位。个人对于社会,不知有直接应负之责任,而惟私于其家。人人皆私其家,则社会之进化遂为之停滞。”^⑨李大钊高呼:“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⑩毛泽东认为,此时“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

① 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年5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页。

② 袁梅:《诗经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604页。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4页。

④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5页。

⑤ 朱熹:《朱子语类》(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8页。

⑥ 《心社趣意书》,载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7页。

⑦ 康有为:《总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

⑧ 梁启超:《〈仁学〉序》(1898),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3页。

⑨ 师复:《废家族主义》,唐仕春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师复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⑩ 李大钊:《牢狱的生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8页。

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①。在与旧家庭宣战、打破旧家庭、废除家庭制度的宣言中，五四知识分子踏上离家出走之路。瞿秋白也痛苦地反省道：“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在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②

（二）合群方式的渐进演进：平衡、断裂及重塑

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表明朝廷靠的是意识形态，而非政治组织来实现保境安民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网络，构成了基层治理的主要形态。在分散化组织原则之下，帝制靠的是基层单元的稳定和家国之间的平衡，而非地方性、区域性中间组织的整合。19世纪，中央集权抑制自主性中间组织的趋势发生了改变。出于地方安全和财政实力的考虑，清廷有选择地允许在功名士子领导下建立自卫型组织。作为动员基层力量的权宜之计，这类中间型组织弥补了家与国之间的组织真空。与此同时，这一应对地方控制退化的做法却加剧了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主义的兴起。但是，存在于家庭或宗族与一统皇权官僚体制之间的中间组织，仍缺乏超出家族和血亲关系之上的合群载体和整合半径。

随着帝国政治体系中可供开发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越来越剧烈的内在革新涌动试图突破其僵硬的政治外壳。辛亥鼎革本就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并未因此终止，反而越演越烈。民国建立后，缺乏组织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观。孙中山指出：“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都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各人的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不能抵抗。”^③

基于现代组织资源匮乏和旧社会散漫无力的现实，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组织革命，才能应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内忧外患。五四时期，组织起来的观点已然相当流行。李大钊认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④在知识分子谋求新的社会位置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具有权势网络意义的共同体，他们或以同乡、同县、同省等地缘网络为依托合群，或以政界、商界、报界、军界等业缘网络为半径合群，或以政党组织信仰规约为载体合群。与以地理空间为边界的地缘合群方式和以职业身份为边界的业缘合群方式相比，现代政党组织形态超越了血缘、地缘、业缘合群方式辐射半径、整合范围的局限。

（三）遭逢巨变的思想跃迁：情感、组织及主义

知识分子的离家出走与合群方式的渐进演进，不仅是一种外在功能的蜕变，更是一种内在思想的跃迁。过渡时代的变动不居，使得知识分子的合群方式、情感表征、行为特质乃至政治倾向、党派立场、人生态度变化得格外迅速和突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论战，共享了同一个前提，便是都曾将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归于道德失范。陈独秀认为，“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⑤。杜亚泉曾将五四知识分子分为四类：一是“知识明敏、感情热烈”者，“常为革新之魁”；二是“知识蒙昧、情感冷淡”者，“常为守旧之侣”；三是“知识明敏、情感冷淡”者，

① 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

② 瞿秋白：《饿乡纪行（新俄国游记）》，端木、郁华编：《瞿秋白散文》（上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1—8月），《孙中山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00、748页。

④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⑤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1919年11月2日），《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4页。

“为革新之中坚”；四是“知识蒙昧、感情热烈”者，属“暴乱派”。^①

五四运动让知识界看到了通过社会运动拯救危机的希望。因火烧赵家楼与学生发生争吵并在第二天退出运动的五四旗手傅斯年认为，未来中国的希望不在政治而在社会，“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②，因此要造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③。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军事和经济现代化摧毁和破坏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威，但并未生成填补权力和权威真空的组织阶梯。五四之后，组织起来成为时人应对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毕其功于一役”的努力方向。

五四时期是一个主义的时代，政治化、激进化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鲜明特征。相较于老师辈知识分子的长于思考、拙于行动，各处学生组织皆有出版物，胡适回忆道：“民国八年一年之内，我个人所收到的学生式的豆腐干报，约有四百余份之多。”^④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后，学生辈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政治行动将知识界的注意力从思想上解放个人转移到改造社会。力求寻得一种共同主义的理想火种在五四知识分子中点燃。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罗章龙信中说：“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⑤到了1922年主义化的信仰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颇具市场。这一年，梁启超如是说：“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源泉，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中国人现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没有信仰。”^⑥在众声喧哗中，主义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身份标识：“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⑦

三、行动重构中的张力及其统合

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使得传统士大夫阶层根深蒂固的行动价值和功能职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政教合一的传统，民初政治与知识生产不可避免地纠缠到一起。侧重于政治一翼的五四知识分子投身于政治革命，并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组织革命的梯次跃迁中确立了社会革命的目标；侧重于学术一翼的五四知识分子倾注于科学功效，并视科学观点为粉碎旧传统和开辟新道路的利器。五四运动的行动派摒弃了个人主义的锋芒，并确立了集体主义的取向；而“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政治革命，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⑧。相较于此前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⑨。但是，由于大量竞争性话语、符号性行动的众声喧哗，使得五四知识分子通向革命之路的行动重构极为复杂。

（一）集体行动的张力、统合及其距离

传统中国平铺散漫、依托于人际网络的社会结构，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垂直组织原则相互交错。家族纽带和地域纽带的盘根错节，使得超稳定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难以自发产生阶级对抗。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被锁定在“在家”与“在朝”之间的功名士子，丧失了维系家国平衡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功能。

-
- ① 杜亚泉：《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1916年），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1—212页。
- ②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5页。
- ③ 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86页。
- ④ 胡适：《五四运动纪念》（1928年5月），《胡适全集》（第2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8页。
- ⑤ 毛泽东：《毛泽东致罗章龙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554页。
- ⑥ 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9页。
- 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0页。
- ⑧ [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 ⑨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讲演》（1920年4月22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

当然，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丧失，也为其在仕途之外开辟晋升之阶提供了新的可能。从新式学堂走出来的新学生，在知识分子代际更替的向度推动着知识分子的分裂及其身份地位的再确定。与知识分子的地区性分裂、行业性分裂相呼应的，是其地缘合群半径、业缘合群半径的日趋扩大。后起的现代政党组织虽然在合群方式上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的政党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民国初年的政治黑暗、军阀混战和民不聊生，一度让中国知识界对政党政治产生怀疑，知识分子不再以参与政党作为唯一出路。原先热衷于政治的领袖人物纷纷放下原来的工作，专心去从事文化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人对欧美资产阶级道路可行性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有识之士看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走向解放之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锋型政党。与20世纪第二个十年遭遇的情况相似，20世纪第三个十年政党组建仍然是困难重重。李大钊于1921年3月指出：“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②学术与政治的抉择使得知识分子面临着“十字路口”的挣扎，个体自由与组织起来的双向形塑构成了知识分子与政党体制分合起落的重要驱动。

相较于民国初年欧美政党的主义多元、组织松散，苏俄政党最大的特点便是主义单一、组织严密。但是，五四知识分子组建政党的集体行动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政党组织集体主义原则与知识分子个人主义锋芒之间的统合日益困难，两种原则在彼此的逻辑强制下产生了巨大的距离。党的一大召开之前，主张地方分权制的李汉俊和主张中央集权制的陈独秀就产生了分歧。李汉俊认为：“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立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作法，很不以为然。”^③党的一大召开之后，长于理论研究与长于组织行动的五四知识分子之间的张力难以统合。因反对陈独秀家长作风而退党的陈望道说：“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④当然，政党组织运行逻辑与知识分子成长逻辑之间的张力并非孤例，中国国民党在改组过程中也存在着部分知识分子老同志辞去党内职务、一度不问党事等现象。

（二）社会运动的共性、特性及其多歧

辛亥鼎革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从甲午、戊戌到庚子以及清末新政，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开始积淀着自下而上的革命，五四运动便是转换轨道的开端。五四运动以文学革命为开端，走出了一条从文学革命到文化革命的行动路线。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⑤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五四开启了一个运动的时代。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已然呈现出分流的态度，上层精英知识分子逐步呈现出远离运动、退回书斋的态度，而青年学生等中下层知识分子却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学生运动之中。五四运动之后，这些知识结构尚未完整、人生阅历相对单薄、思想倾向极具理想化色彩的学生，势必在理想化的诉求下遭遇挫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后，具有高度组织化、动员化色彩的两大政党以国共合作的形式走上中国政治舞台。新型政党彰显出极大的活力，并按照其独特的组织运行原则凝聚社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政党的组织化特征和政治化驱动，训练了学生、训练了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政党组织的有机互动，极大地动员了社会力量。国民革命时期各类风起云涌的运动在释放组织动员能量的同时，也通过革命行动对知识分子进行“规训”。青年知识分子在政党组织运行逻辑的“规训”下，充分发挥其组织、动员、宣传能力，积极参与到革命中来。然而，知识分子群体发展的步伐却远远未跟上政党组织运行逻辑“规训”的脚步。随着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发展，逐步超出了政党组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② 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1921年3月），《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49页。

③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99页。

④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99页。

⑤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0、703页。

织的“掌控”，如何驾驭、引导各类运动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成为急需解决的议题。

随着“运动”的高涨，走在最前沿的知识分子明显感觉到被自己所“动员”起来的“运动”所“动员”，运动的节奏、冲击的力度、触及的深度、影响的范围、波及的层面，都远远地超出了他们最初的预计。当然，知识分子群体在各项“运动”起来之后被“裹挟”的面向，是政党组织原则所不能接受的。因此，防止“运动”失控成为逻辑必然。政党组织与知识分子的互动给两者都带来了新的变化。政党不再以知识分子作为唯一主体，知识分子也不再以参与政党作为唯一出路；政党组织按照其“政统”原则去“规训”知识分子并选择符合组织原则的新生力量，知识分子按照其“道统”原则去“评判”政党原则并选择符合信仰原则的物质力量。如果说，让社会运动起来，是革命发生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控制运动向着可控、有序的组织化方向发展，则是推进革命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五四知识分子并未全部跟上政党组织运行逻辑、中国社会革命逻辑的渐进演进。

（三）中国革命的挫折、转向及其再起

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是当时中国秉持革命道义的重要政治团体。民国初创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舆论导向占据一定影响。随着西方议会道路的失败，孙中山开始转向为革命党一党治国的逻辑理路。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主要借鉴了苏俄的治党建军经验。在各类社会思潮杂糅涌动、各种政治力量竞相发声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势必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规约”。一面是政党组织运行逻辑与传统社会网络结构之间的双向“撕裂”，一面是复调思想资源呈现与一元主义指导思想之间的双向“挤压”。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内各派系力量的博弈及军权力量的崛起，国民党组织运行逻辑逐渐呈现出难以“承受”各派系“撕裂”之苦，最终以国民党“清党”而收场。国民党试图以“清党”的方式去清除其组织运行的不足之处，却在“清党”后深陷组织涣散之苦。文武之间的张力、军权政治的崛起使得知识分子不断被挤压到边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此时，五四知识分子在党员数量上占据优势。为建立群众性政党，党在创立初期积极动员革命知识分子组织工人阶级。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指出：“应该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的激情，从中挑选最宝贵的坚定的革命分子，用来组织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①随着领导机构、职权层级、制度规定等原则的日益完善，那些不符合政党组织原则的知识分子，或被挤压到政党组织边缘甚至被挤压到政党组织之外，或者克服了那些与政党组织运行逻辑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习气。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的强有力的组织纪律约束，使得国民党极为恐惧，出现了“50万国民党”害怕“5000个共产党”^②的说法。革命是一座大熔炉，要求加入了组织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有机的知识分子。那些在政党组织原则下反复摇摆、尝试中立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势必在政党组织“整齐划一”诉求下显得“格格不入”。当然，知识分子的痛苦与迷茫并未持续太久，就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军事较量、政权对峙局面中迅速分化分流。不同的思想选择与革命行动，造成了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在革命之再起中，许多五四知识分子中的中共党员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以及个体选择。

四、结 语

“五四”既是一个各类主义众声喧哗的时代，亦是一个知识分子挣扎和选择的年代。胡适曾以1923年为界对中国现代思想分期：前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是“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③瞿秋白曾将1925年五卅运动视为五四时代的终结：“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晚于1922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2—384页。

③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1933年12月22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730页。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谈阶级斗争。”^①毛泽东曾将1927年视为新的阶段的开启，在1927年至1937年间“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②。作为五四知识分子通向革命之路的政党载体，1927年的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从创党到立党、从城市到乡村、从精英到大众的思想再造、组织再造和行动再造。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那些在思想上与党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五四知识分子势必遭遇到强势挤压，那些损害组织利益、影响组织发展、危机组织安全的五四知识分子被挤压到严密组织体系之外。从五四知识分子通向革命之路的思想路标、组织路标和行动路标来看，1927年标志着广义的五四时代的终结，但是五四精神并不会远去。“五四”充满了一系列悖论式问题，大量的竞争性话语和符号性行动同时涌现并持续回响。现代组织与传统组织、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行动与政治行动等元素都有待于整合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

Function Deconstruc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Action Reconstruction: The Path of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to Revolution

LIANG Jun-si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China'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rought about the emergence and re-emergence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gave birth to the function deconstruc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action re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s. "May Fourth Movement" is a profound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 but also a great mass patriotic movement. Among them, the function de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ontinue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piritual temperament, political ideal and action strategy of the traditional distinguished scholars.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is shaped by the practical logic of intellectuals leaving home, gradually evolving their modes of association, and undergoing significant ideological shifts when confronted with enormous changes. Its action reconstruction is forged i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movement and revolutionary action. Certainly, the bounda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ath of revolution are not clear and insurmountable, and can be transforme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n conclusion, placing the examination of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path to revolution within a long-term context is beneficial for shedding light on the ongoing societal rol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the current context, and th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Functional Deconstruc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ction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赵蔚平]

① 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1926年1月2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60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2页。